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系列学术丛书



中国古代德育 思想史论（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系列学术丛书

中国古代德育 思想史论（上）

· 黄 钊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论 / 黄钊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 -7 -5004 -9089 -0

I. ①中… II. ①黄… III. ①德育 - 思想史 - 中国 - 古代
IV. ①G41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5286 号

责任编辑 田 文
特约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72.25

插 页 2

字 数 1380 千字

定 价 138.00 元 (上、下册)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顾海良

新世纪之初，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显著标志，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成果。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不仅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决定的，也是由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决定的，而且还是由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的要求决定的。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武汉大学一直居于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前列。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作为学科建设和发展的主要承担者，学院的教师和研究人員为此付出了极大的辛劳，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现在编纂出版的《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系列学术丛书》就是其中的部分研究成果。

回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实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既要尊重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要遵循学科建设和发展的特殊要求，要切实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影响力。希望《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系列学术丛书》的出版，能为切实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影响力增添新的光彩。

第一，要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学术影响力。把提高学术影响力放在首位，是从学科建设视阈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要 求。学科建设以学术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个整体的一级学科，在提升学科的学术性时，要按照学科建设内在的普遍的要求，使之具有明确的学科内涵、确定的学科规范和完善的学科体系。

学术影响力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学科建设水平的重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术影响力，不仅在于国内的学术影响力，还应该树立世界眼光，产生国际的学术影响力。在国际学术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以学术研究为基本特征和主要导向的。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研究，不仅有利于达到学科建设的基本要求，而且还有利于国际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交流，产生国际的学术影响力。比如，一个时期以来，国际学术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文本、传播的研究，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研究，科学考据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的编辑与研究等，

就是国际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发展中，不但要高度关注和重视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且要参与国际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理论重大课题的研究。在国际马克思主义学术论坛上，我们要有更广泛的话语权，要能够更深刻地了解别人在研究什么、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研究到什么程度、有哪些重要的理论成就、产生了哪些理论的和实践的成效等。如果一方面强调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另一方面却在国际马克思主义论坛上被边缘化，这肯定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学科建设的结局。

第二，要提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力。任何学科都有其特定的应用价值。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力，就是这一学科应用价值的重要体现，也是这一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目标和根本使命。在实现这一影响力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是重点；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于实践、以此推进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根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力，要体现在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的不断探索上，并对这些问题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不断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一定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产生重要的影响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解决提供基本的指导思想，充分体现学科建设的应用价值。

第三，要提高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发展和安全的影响力。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自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要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特定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夺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学科建设中，我们要以高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和创新，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政治理论领域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成效，进一步维护和发展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新世纪党的建设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按照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

有创新精神的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第四，要提高全社会的思想理论素质，加强全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的影响力。全社会的思想理论素质是一定社会的软实力的具体体现，也是一定社会的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如何切实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影响力，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最为重要和最为紧迫的任务和使命。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影响力，首先就应该体现在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建设全过程中。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用当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人民、武装人民的头脑，内化为全体人民的思想观念与理论共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艰巨任务，特别是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目标。

以上提到的四个方面的影响力——学术的影响力、现实应用的影响力、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在对四个方面影响力的理解中，既不能强调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学术性而否认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政治性与意识形态性；也不能只顾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政治性与意识形态性而忽略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学术性。要从学科建设的战略高度，全面地探索和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影响力。

我衷心地希望，《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系列学术丛书》能在提高以上四个方面影响力上作出新的贡献！

自序

这部书稿，经过十多年的艰苦拼搏，已于近日最后杀青。此时此刻，我如释重负，感到从未有过的快慰与兴奋。放下汉王笔，走出小书斋，呼吸大自然的清新空气，感受金秋季节人们在丰收后的欢乐，回顾自己十多年所走过的著书之路，思潮起伏，浮想联翩，有许多话要说。借撰写此《序》之机，在此谈谈个人的体验与感受。

(一)

“德育”这一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德育，仅指伦理道德教育；广义的德育，则指的是“思想道德教育”或“思想政治教育”。“思想道德教育”，指的是以道德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则指的是以政治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教育。可见，无论是“思想道德教育”，还是“思想政治教育”，从本质上说，都属于思想教育。“思想教育”是关于思想观念方面的教育。思想观念，涵盖面很宽，凡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等等，皆属于思想观念范畴。所以，广义的德育，要比狭义的德育宽得多。据此，我们给“德育”下这样一个定义：所谓“德育”，指的是一定的社会或阶级，为培养和提高受教育主体思想政治品德的综合素质而进行的相关教育。这种广义的“德育”，从内涵上扩宽了“德育”之“德”的包容量，从而提高了对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品德综合素质方面的目标要求。

“德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进入大学讲坛，是近二十余年的事。时下，不仅教育学中的二级学科有“德育学”，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中，也有“思想政治教育学”。这“思想政治教育学”，从本质上说，也属“德育学”。因此，当今的“德育学”所讲的“德育”，亦指的是广义的德育。它们作为学科的建立，都旨在推进和完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或思想政治教育，以便全面提高受教育者思想政治品德的综合素质，培养合乎时代需要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本书名为《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论》(以下简称《史论》)，顾名思义，它是关于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之论。中国古代德育思想，有自己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客观地阐述与揭示这一历史，可以为当代德育理论与实

践,提供必要的知识借鉴。现实常常与历史有某些相通、相似之处,前人的德育思想成果,常常对改进与深化现实的德育理论与实践,有借鉴参考的价值。这是因为,前人德育思想中的优秀成果,有的已揭示或猜测到了德育活动中的某些带规律性的认识,这是一笔极其宝贵的思想遗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因此,发掘与总结中国传统的德育思想成果,对于社会主义德育建设,有着不可低估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书所阐明的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发展史,亦是从广义的“德育”角度立论,即阐明古代思想家关于世界观(或宇宙观)教育、政治观教育、道德观教育方面的思想观点。这些观点,都从不同侧面表达了古代思想家关于实施德育的理论思考。而揭示与阐明这些理论思考,就成为《史论》的关键内容。

(二)

我为什么要撰著这部《史论》?在回答这一问题前,有必要先谈谈本人进入德育学科,以及确立自己科研方向的过程。

进入德育学这门学科,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偶然的机。我原本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1987年冬,因特殊原因,我由湖南湘潭大学调入武汉大学,被安排进入思想政治教育系。此后,我与德育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尚处于起步阶段,课程设置还不怎么规范。领导给我安排的课程,是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我承担起了这门课程,并撰著成教材:《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希望用自己的劳动,为学科建设出力。但是,随着专业意识的提高,我开始发现我讲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这门课,并非本专业的课程。因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属于政治学专业的必修课。我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似乎有点文不对题。出于对此的反思,我逐渐意识到,自己有点不务正业。为此,我开始思考如何把自己的科研方向转到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或曰德育专业)学科史的建设上来,具体地说,就是探索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我认为,任何专业,都有自己的学科发展史。学科发展史,是学科以往发展情况的反映,是前人实践经验的智慧结晶,是学科得以确立与发展的先基。研究学科史的目的,在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前人在本学科领域所思考过的理论问题进行系统总结与反思,从中吸取经验与教训,为今天的学科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在这方面,许多成熟的老学科,都做得很好。例如,搞哲学的,不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而且还下功夫研究中国哲学史和外国哲学史;搞法学的,不仅研究中外法律制度史,还研究中外法学演变史,等等。思想政治教育学(或曰“德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自其建立以来,

关于学科史的发掘与研究，尚属于薄弱环节。虽然，本专业已经开设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这门课程，并且编写了相应的教材，在学科史的研究方面，算是有了一个起点。但是，用我们应当研究的学科史范围、任务来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须知，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史，上下五千年，思想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与之比起来，不过是中华民族德育思想长河中的一小朵浪花，它无论如何代替不了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史。因此，探索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史，是德育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客观需要，势在必行。然而，当时在本专业领域内，有一股“左”的偏见，对传统思想教育史，基本持否定态度。最典型的，莫过于有人所散布的“两论”，一曰“独创论”，一曰“过时论”。为了阐明问题的本质，这里有必要对“两论”作简要剖析。

“独创论”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独创”，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以后，中国才开始有了这一特有的社会现象。据此，他们继而认为，古代中国根本没有“思想教育”存在，因而今人也无法从古人那里找到有关“思想教育”的历史借鉴。显然，这一看法是片面的，说得确切一点，是一种对历史的无知。他们不懂得，思想教育是伴随人类文明进步而产生的，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思想教育就成为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一个重要手段。思想教育的实质，是教育者运用一定的立场、观点、方法，使受教育者接受某种思想观念或理论原则，并改变思想认识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活动。这一活动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总是要尽力培养本阶级的接班人，使之按照本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改造世界，安邦治国；与此同时，他们也总是要千方百计去驯服被统治阶级，使他们心甘情愿地服从统治，接受治理。为此，统治阶级就需要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方法，向人们宣传、灌输统治阶级的各种思想观念或理论原则，以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愿望。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进行思想教育活动的过程。所以思想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活动，早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时，就已经出现；伴随历史的发展，思想教育也在不断发展。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相应的思想教育存在，只是在教育目的、内容、途径、方法等方面，各不相同罢了。所以，思想教育并非马克思主义的“独创”，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历代统治阶级早已投身于思想教育活动，并创造出许许多多有关思想教育的成功经验和理论成果，中国古代亦不例外。

综观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可知古代中国早已有了思想教育活动，只是那时的人们，还未创造出“思想教育”或“思想政治教育”、“思想道德教育”以及“德育”这些用语。他们用的是“传道”、“明德”、“劝贤”、“教化”、“化民成俗”等词语。这些用语在含义上同“思想教育”或“思想政治教

育”、“思想道德教育”、“德育”是基本一致的。古代中国不仅有了思想教育活动，而且早已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学术流派，他们在自己的学术实践中，建立起各不相同的思想教育学说体系。例如，活跃于先秦时期的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著名学派，在思想教育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创造：儒家的“仁者爱人”说、墨家的“兼爱尚贤”说、道家的“尊道贵德”说、法家的“明法审令”说等，都作为当时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广为流传，并对后世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因此，那种把思想教育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独创”的见解，完全不合乎历史发展的实际。它的错误在于，否定了人类的德育有自己发生发展的历史，夸大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开创”人类“德育”的功绩，从而割断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同人类文化史的联系。其结果，只能把人们引向一个十分荒谬的结论：“中国古代无思想教育。”这无疑极其错误的。

“过时论”者认为，中国古代思想教育，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到了今天，已完全过时，不能为我所用。他们的错误，在于夸大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依赖性，抹杀了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诚然，中国古代的思想教育成果，多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它们到了今天，有一些确实已经过时；但是，并非全都过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某种社会意识原来依存的社会存在消失了，但该意识不一定跟着消失，它有可能附着于新的社会存在继续保存下去。这种情况，正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表现。关于这种现象，李瑞环同志曾作过深刻论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文化遗产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共同成果，这就决定了若干文化遗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也就是说，不但物质文明，而且包括精神文明的许多方面，不是某一个阶级所独有的，而是经过不同阶级世世代代的努力，共同创造的成果；它也不是只为某一个阶级服务的，而是一视同仁地为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所服务。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历史文化遗产的阶级性，又要重视它的承继性和借鉴性。”^①李瑞环同志的这些论述，说明有些文化遗产具有超阶级、超时代的特性，它不仅在历史上有其存在的价值，而且到了今天仍可为我所用，没有过时。例如，我们祖先所倡导的传统美德，包括一系列优秀民族精神，有许多到了今天仍在闪闪发光。它既可以丰富当代思想道德教育的内涵，又可以引导人们借鉴历史经验，还可以产生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激人向上，引人入胜。所以，把中国古代思想教育成果全都视为“过时”，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基本原理，违背文化发展具有民族继承性和借鉴性的正确法则。任其泛滥下去，只能导致简单抛弃前人的思想遗产，把人们引向历史虚无主义。

^① 《重视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发掘与研究》，《光明日报》1990年6月3日。

以上说明，无论是“独创论”还是“过时论”，其骨子里的东西，就是用“左”的眼光看问题，从根本上排斥传统文化，否定德育专业对德育思想史借鉴与利用的必要性。

通过对“两论”的分析与批评，使我清醒地意识到，撰著一部有关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史方面的书，既有助于排除本专业建设过程中的“左”的干扰，也有助于为本专业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这也就成为我决定撰写本书的思想动机。但是，仅有此动机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要排除“左”的干扰，并非个人的能力所能办到，还需要有政治环境的支撑。幸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党中央有关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的方针政策愈来愈明确。这就使我研究德育思想史的计划能够名正言顺地确定下来。于是，我把自己的科研方向确定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思想道德建设”。大约在十四五年前，经学校批准，我原讲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课，改为“中国传统德育的理论与实践”，首先在研究生中开课。由此，我开始探索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的发展历程，从而把自己的教学与研究，同本专业学科史的建设结合起来。虽然，这对于我来说，经历了艰苦的专业转换过程，但是，这又使我得到慰藉，因为我可以心安理得地为自己的专业建设尽绵薄之力。大约在讲授新课两三年之后（20世纪90年代末），我开始了本书的构思与撰著工作。此后，2001年5月，我申请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我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的继承与创新研究》，获得批准。这就使我更加坚定了撰著本书的信心。后来，我以本书的前期成果，使该课题按时结题。从而，让我能在相对长的时间内，更加从容而充分地完成本书的撰写计划。

（三）

科研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要撰成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方面的著作，有相当的难度。因为，这对于我来说，具有垦荒的探索意义。在当代中国，尚未见到一部立足于广义“德育”的德育思想史著作。从名称上看，在这部拙著之前，似乎也有几部题名为《中国德育思想史》的新著。但是，细读其书，可知它们都是立足于狭义“德育”而著成的德育思想史。这种德育思想史，同以前学界出版的《中国伦理思想史》，属于同一类著作。而同我们所要撰著的以广义“德育”为内涵的《中国德育思想史》，有质的差异。这也就是说，我要完成自己的写作计划，学界尚无可供借鉴的同类著作，一切都得要靠自己去思考、探索、开掘。这无疑是极其艰难的事。好在我自己在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有一个基础：我曾系统讲授过“中国哲学史”课，也曾系统讲授过“中国政治思想史”课和“中国传统德育理论与实践”课。与此同时，

还先后出版了《道家思想史纲》、《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纲》、《帛书老子校注析》、《三德教育论纲》、《中国道德文化》、《儒家德育学说论纲》、《东山法门与禅宗》等相关著作。从这些著作所反映的知识结构来看，涵盖了儒、道、释三个方面。毫无疑问，这些对于我撰著《中国德育思想史》，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要完成预定中的写作计划，仅靠以上有利条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既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宗旨，也有自己独特的篇章结构与思想内容。而这一切，并非凭既有的知识基础就能构建起来，还必须脚踏实地去做许多工作。为此，我勉励自己以严谨求是和奋力拼搏的精神，来达到既定的目标，而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就是“吃透两头”。这里所说的“吃透两头”，指的是“吃透”德育思想史所涉及的“古”与“今”两个方面。

第一，要吃透古代：德育思想史的基本内容，是要系统梳理、发掘、总结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德育思想成果。这就必须吃透古代思想家用来表达德育学说的思想资料。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不仅认真阅读了多种版本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伦理思想史》、《中国教育思想史》等属于研究中国思想史方面的一系列著作，还特别认真地选读了历代著名思想家的基本原著（这是特别需要用功的方面），力求在吃透古代方面，迈出扎实的步伐。

第二，要吃透当代：我所要探讨的虽是古代德育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但这种历史不能脱离当今的时代气息，也就是说它必须与当今的时代精神相观照。这就必须在“吃透当代”上狠下功夫。这里所讲的“吃透当代”，指的是熟知当代德育宗旨、德育目标、德育内容、德育途径与方法，一句话，就是熟知当代社会主义德育的真精神。这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从三个方面进行学习与研究：一是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我党三代领袖人物关于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系统论述；二是认真学习了党中央近二十年来颁发的有关提高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或德育工作的一系列文件；三是认真研读了近年出版的多种版本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以及《德育学》原理方面的著作。这一切努力，都旨在“吃透”当代中国德育基本精神，以求用当今的时代精神指导《史论》的撰著。

以上两个“吃透”的具体实施过程，实质上就是通过读书，“上下求索”，把“古”与“今”贯通起来。“吃透古代”，就是通过阅读与古代德育思想成果相关的书，力求把握中国古代德育成果所涉及的主要思想资料，以便在构建《史论》时，能抓住重点与核心，不致偏斜与缺失；“吃透当代”，就是通过阅读与当代社会主义德育相关的思想资料，力求把握当代德育的真精神，以便用当今的时代精神，指导全书的撰写。“书中自有真精神！”认真读书，是我完成本书撰著的关键所在。古人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我不敢说自

已读“破”了“万卷”书（事实上，连“百卷”书或“数十卷”书，也未敢妄称为“读破”），但老老实实读书，却是我这些年来真切感受。多年来，虽年老体衰、眼花耳闭，却迎寒送暑、孜孜以求。直至“衣带渐宽”、“须眉变白”，也无怨无悔。总的感受是：“十年寒与暑，温凉我自知。甘为孺子牛，躬耕未敢辞。”

（四）

本书的撰著，前后达十余年之久，可谓经历了“十年磨剑”或“十年面壁”的艰苦奋斗过程。功夫不负苦心人，值此书稿杀青之时，我再从头到尾认真地阅读了全稿，长舒了一口气，深感这些年的心血没有白费。本书的主要收获或曰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体系比较完整。从体系上看，本书构成了一部独特的以广义“德育”为内容的、较为完整的、有关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的著作。全书在《导论》之下，分作上、中、下三篇。上篇为先秦德育思想史，中篇为秦汉至隋唐时期的德育思想史，下篇为宋元至明清时期的德育思想史。每一篇的开端，都有专门章节阐述所对应的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以便为各篇思想史的展开提供社会背景方面的依据。全书共计三十六章，分别阐述了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派、不同思想家的德育思想成果和德育理论创造，计一百一十余万字。被评述的思想家，约一百二十人。此外，还涉及未署作者之名的著作多部（如《易经》、《易传》、《诗经》、《孝经》、《礼记》，等等）。这都表明，《史论》在总结、发掘中国德育思想史方面，具有内容涵盖面宽、信息容量大的显著优势。虽然，我不敢说本书有多么大的独创之功，但作为一部体系完整、内容充实的有关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方面的著作，它没有“滥竽充数”。对此，笔者感到问心无愧。

第二，将研究的触角，伸向了夏、商、周等远古时代。过去，一般的思想史著作，多从春秋末年的孔子开始。本书则不同，它把夏、商、周时期的德育思想，也列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有针对性地扼要探讨了这段时期德育思想的基本内容和表现形式。这同以往的同类著作相比，确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笔者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考虑到中国奴隶社会从夏代开始，只有深入发掘夏、商、周时期的德育观念，才能全面考察和透视中国奴隶制时代的德育思想状况，才能引导人们全面认识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因此，本书重视远古德育思想的研究与探索，这有助于将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引向深化。

第三，在写作上，注重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历史的发展，总有自己特定的客观进程。作为一部德育思想史，必须尊重历史的客观进程，而不能违背这一

进程。这就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德育思想史的演绎。但是，思想史的发展，除了与历史的足迹相联系外，还要受理论演变过程中的自身“逻辑”发展的制约。这就要求我们，注意把历史发展与逻辑进程有机地统一起来。在这方面，本书也颇为用功。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儒、佛、道多种思潮并起，相互交织，呈现出某种混乱状态。为了梳理这一时期的德育思想史，我们重点安排了以下五章：（1）魏晋玄学家的德育思想；（2）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学者的德育思想；（3）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学者的德育思想；（4）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学者的德育思想；（5）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批判思想家的德育思想。通过这五章的编排，把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分野的情况客观地展现了出来，这符合历史主义的要求；同时，在具体阐述中，又注意揭示玄学与道教的关系，佛学与玄学的关系，儒学与佛、道的关系，道教与佛教的关系，以及社会批判思想家对玄学、佛教和道教的批判。这就较为深刻地揭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发展的相互关系及其内在逻辑。从而坚持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应当说，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第四，十分重视对先贤德育方法的发掘与总结。德育方法，指的是在对受教育者（包括自我教育）实施德育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方法。中国古代思想家多重视德育方法的设计与运用。如，孔子所倡导的“因材施教”法、“举一反三”法、“愤启悱发”法等属于“循循善诱”式的德育方法；孟子所倡导的以“反求诸己”、“反身而诚”、“求其放心”为特色的“反省内求”法；荀子除了倡导教育者对被教育者的教育方法和受教育者自我修身的方法原则外，还提出了相关的“道德评估”法，等等。顺应这一情况，我们在发掘、总结思想家们所创造的德育理论的同时，也注重归纳、梳理他们所倡导的德育方法。这种有关德育方法的内容，在本书中约占有一分之一的分量。将之串联起来，几乎可以构成一部独特的《中国古代德育方法史》，这无疑又是一大特色。过去，无论是《中国教育思想史》，还是《中国伦理思想史》，都很少具体探讨思想家们关于“方法”的见解。

第五，注重“史”与“论”的有机结合。这里说的“史”，指的是本书所系统阐述的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所说的“论”，指的是作者在本书中对思想家们所创造的德育学说所作的评论。笔者认为，正确而客观地归纳、概括思想家的德育理论创造，这是“史”的要求，也是本书核心内容所在，应当特别用功去做；与此同时，在书中对思想家们的理论创造作出画龙点睛式的评价，也不可忽视与怠慢。因为正确而客观的评价，可以揭示思想家的思想成果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作用。这中间，既有褒扬，亦有批评。好的评论对读者有启示和引导作用。例如，本书在写完孔子的德育学说后，作了这样一段评论：

“以上……孔子在道德教育领域所作的杰出理论创造……对我国后来的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后来孟子、荀子以及秦汉以降历代儒家学者，虽然思想道德教育体系各有所别，但在基本倾向上，都同孔子思想保持一致。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正在日益加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认真发掘和继承孔子关于道德教育学说的积极成果，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对于推进全人类的文明进步，都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以上评述，虽然还可再作推敲，写得更精练一些。笔者将之摘录于此，是为了说明本书注重“论”的一个特色。在“史”、“论”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努力做到以“史”带“论”，以“论”明“史”，使“史”、“论”相得，互补互融，进而引导读者从书中吸取营养与理论借鉴。

除以上五大特征外，本书还在史料的考订与筛选方面，在对一些重大思潮作宏观概述方面，在对时代特征作具体分析方面，等等，都作了相应的努力。

以上，笔者从四个方面，谈了自己撰著本书的心得体会。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个人学术水平和知识面的某些缺陷，书中也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例如，关于佛教和道教德育思想的探讨，本书在汉魏隋唐时期，均有所涉，而在宋元明清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却未能涉足，这不能不属于一大缺陷；又如，中国历史上，经学思潮时起时伏，它同德育思想联系紧密，值得认真发掘，而本书却限于作者的知识面，对之涉猎极为有限、肤浅。这确实令人遗憾，特在此表示诚挚的歉意，并期盼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这部书的写作，是在我的晚年完成的，经历了从“花甲”到“古稀”的年龄演进。曹孟德曾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来表达其晚年的壮志豪情。此时此刻，我不敢以其志自比，但乐意向他学习，力求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则是发自内心的真切愿望。值此书稿杀青之日，喜赋拙诗一首，以畅情怀：

三十六章^①展新篇，激情汹涌忆当年。
古今贯通勇拼搏，上下求索敢攀援。
儒墨精深勤探讨，佛道玄妙喜钻研。
十载面壁诚辛苦，传薪播火乐陶然。

黄 钊

2009年8月25日于珞珈山勤补书斋

^① 此“三十六章”，代指本书，因为全书共有三十六章。

目 录

总 序	顾海良 (1)
自 序	(1)
导 言	(1)
第一节 本书的研究宗旨、任务、对象和范围	(1)
一 本书的研究宗旨与任务	(1)
二 本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	(4)
第二节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源流概述	(6)
一 夏、殷、西周时期：中国德育思想早期萌发阶段	(7)
二 “百家争鸣”时期：儒、墨、道、法诸家的德育思想	(10)
三 秦汉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德育思想的新发展	(13)
四 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德育思想的新创造	(18)
第三节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基本特征	(22)
一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具有典型的民族性	(22)
二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23)
三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成果具有可继承性和借鉴性	(24)
第四节 学习与研究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的意义与方法	(26)
一 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的意义	(26)
二 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德育思想史的方法	(30)

上 篇

先秦时期的德育思想

第一章 先秦时期德育学说形成和发展的社会条件	(35)
第一节 夏、殷、西周时代的社会概况	(35)
一 夏代的社会状况	(35)
二 商（殷）代的社会状况	(36)
三 西周时代的社会状况	(37)
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概况	(38)

一	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38)
二	政治经济变革与阶级斗争	(40)
第二章	夏、殷、西周至春秋中期的德育观念	(43)
第一节	夏、殷时代的德育观念	(43)
一	天命观：夏殷时代德育观念的核心内容	(43)
二	夏殷时代透露了早期“民本”观念	(45)
三	夏殷时代关于“德”的概念	(45)
第二节	西周时代的德育观念	(46)
一	《易经》中的德育观念	(47)
二	《洪范》中的德育观念	(49)
三	周公的德育观念	(51)
四	《诗经》中的德育观念	(53)
五	西周末年邵公、史伯等人的德育观念	(56)
第三节	春秋前、中期（或稍后）的德育思想	(59)
一	管仲、晏婴的德育观念	(59)
二	叔向、史墨的德育观念	(60)
三	子产、邓析的德育观念	(62)
第三章	儒家的德育思想（上）	(64)
第一节	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德育思想	(64)
一	以德治为目标的德政说	(65)
二	关于德育内容的设计	(66)
三	注重塑造具有民族特色的“君子”人格	(68)
四	以“循循善诱”为特征的教育者对被教育者的施教方法	(70)
五	以严于律己为特征的自我教育方法	(73)
第二节	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的德育思想	(75)
一	以“性善论”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基础	(76)
二	以“民本论”为特征的“仁政”说	(79)
三	以“反省内求”为主要特征的道德修养方法论	(81)
第三节	荀子以“性恶论”为基础的德育思想	(82)
一	荀子的宇宙观	(83)
二	荀子的政治观	(85)
三	荀子的道德观	(89)
第四章	儒家的德育思想（下）	(96)
第一节	《易传》的道德理念	(96)
一	注重对《易经》道德观念的阐发与创新	(97)